

明清时期内地汉族移民 西南边疆地区的流向研究*

——以云南永昌府为例

吴臣辉

摘要: 明清时期,地处西南边疆的云南永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与皇朝中央实施移民戍边、内地化政策密切相关,大量移民涌入永昌,形成内地移民西南边疆地区的高潮,如此大规模的移民流向何处?或落籍边疆,成为边疆开发的生力军;或继续迁徙,成为移民缅甸的主力军;或不能适应气候环境,返回原籍,甚至染疾身亡;或逃避赋税,隐姓埋名,涵化随乡入俗。移民的多层次流向构成移民分布的散居性特点,各族人民和谐相处,共同守卫边疆、开发边疆,为边疆繁荣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 西南边疆;云南永昌府;移民;散居性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2335(2013)04-0092-04

明清时期,永昌府辖区范围虽有伸缩,但地域广阔是其疆域的主要特征,包括今天云南保山市、德宏州全部,临沧市大部分地区,以及大理州西部、怒江州西南部、缅甸东北部地区等广大地区。自元统一西南边疆以来,内地汉族以各种方式源源不断移民云南,或落籍定居成为“客家人”,或继续迁徙成为陆地中转站。

一、落籍边疆:成为边疆开发的生力军

滇西永昌府地区由于其毗邻缅甸,地缘政治经济战略地位凸显,明清中央政府继续采取有效的卫所制度、绿营兵制、汛塘兵制以及招徕内地汉族移民到云南进行军屯和民屯,共同戍守边疆,开发边疆。随着边境事端繁多,中央政府派往滇西边境的守军与日俱增,而滞留在边境的兵士也增多,逐渐定居在边境地区。

(一)从戍守边疆的将士到开疆拓土的主力军

自秦汉始,永昌府是移民的重点区,明代永昌

府地区有永昌卫 10 个千户所,腾冲卫 6 个千户所,顺宁府右甸 1 个守御所,永昌姚关 1 个千卫所,如果每所按 1200 人计算,就有 21600 人军籍卫所屯守永昌边疆。有清一代,汉族移民云南更甚,嘉庆二十五年(1820),永昌府人口为 25.2 万,腾越厅人口为 26.8 万,道光十年(1830),永昌府人口上升至 53.3 万,腾越厅人口上升至 37.4 万,在十年间,永昌府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 79.2‰,而腾越厅的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达 33.8‰,^{[1](P215)}显然,导致永昌府和腾越厅人口急剧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内地汉族移民涌入所致。最终,涌入的人口主要落籍在西南边疆要塞,成为开疆拓土的主力军和生力军。

明初,中央政府从政治军事上加强对西南边疆地区的实际控制,通过设立地方行政机构和增派军队加强边疆戍守,实施军屯解决边疆守军的“军粮问题”。朱元璋曾在给征南将军傅友德、蓝玉、沐英等说:“有粮军回,云南无后患;若守军无粮,大军既

吴臣辉,男,云南大学历史系博士,保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经济史。

*基金项目:2013 年保山学院重点课题(项目编号:01005)。

回,其守军必逃。军逃日久,城中必虚,蛮人知其所以,其患复作,事难制矣。”^{[2] (P592)}洪武十九年(1386),西平侯沐英奏:“云南土地甚广,而荒芜居多,宜置屯,令军士开耕,以备储偓。”通过军屯不仅解决了军队的粮饷问题“屯田之政,可以纾民办,足兵食。边防之计,莫善于此。”^{[3] (P553)}同时,也使大规模的军屯将士驻扎于西南边疆。随后在全国购买耕牛农具等生产资料分配给边疆将士屯田之用,洪武二十年(1387),“遣右军都督金事孙茂。以钞二万二千锭,往四川省耕牛万头。时将征百夷,欲令军士先往云南屯田,预备粮储故也。”^{[3] (P554)}

永昌府东部的永平县在秦汉时期就开始有汉族人口迁移至其境内进行垦殖,元明清时期,内地汉族人口大量进入永平,《永平县志》载:“汉族来永,始在元、明之间,其先多为江南湖广籍,或以从军远征,或以放谪游宦,其后侨居流寓,子孙因以为家。”明代把遣戍的军卒流放云南边疆的卫所,为了使他们在边疆安家落户,把他们的妻室一并带上,通过这种方式进入永平的汉族移民比以往任何时期都多。清末至民国时期,从四川又先后移来一些汉族人口,被称之为“客家”,随着时间的推移,汉族人口逐渐增多,成为境内人口最多的民族,1954年,永平县人口为7.8万,汉族5.8万,占73.7%^{[4] (P618-622)}

(二) 从垦殖边疆的客商到流寓边陲的侨民

明朝政府为了巩固西南边疆以及抵御缅甸的入侵,不断增派边防驻军,尤其是正统年间的麓川之战更是从四川、湖广、贵州大量调集部队入驻永昌府地区。随着驻军增多,军粮不给,明朝中央政府不仅下令戍边将士自己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以自给,不仅从内地招募移民至边疆开荒种地,还实行“开中法”,“明初,募盐商与各边开中,谓之商屯。”^{[5] (P1885)}许诺给商人“盐引”吸引他们投资开发边疆,生产粮食换取利润颇厚的盐引差价。

正统五年(1440),行在户部奏:“云南金齿军民使司、大理府用粮数多,蓄积数少,宜招商纳米,中淮浙、云南盐各三十万引。金齿足食仓纳米者,淮浙盐、云南盐每引二斗;大理崇盈仓纳米者,淮浙盐每引一斗五升、云南盐每引三斗。”^{[6] (P571)}如此,通过招募内地穷苦百姓移民边疆以及商屯缓解了当时军粮奇缺的问题,同时,这些移民以及商人招募来的屯田客逐渐在边疆定居下来成为新一代的居

民。

清初,云南社会相对稳定,人口增长较快,人地矛盾日益突出,正如清雍正帝所说:“国家承平日久,生齿殷繁,地土所出,仅可贍给,倘遇荒歉,民食维艰。将来户口日滋,何以为业?唯开垦一事,于百姓最有裨益。……嗣后,各省凡有可耕之地,听民相度地宜,自垦自报,地方官不得勒索,胥吏亦不得阻挠。”由军士、舍丁、军余组成的军屯驻扎在边疆守卫国土,开荒种植,有的成为永久性定居于此,为祖国的边疆守护、统一和开发做出重要作用。

18世纪的清代中叶,德宏州的商业贸易和手工业有了进一步发展,四川、湖广、滇南、大理一带的商人、手工业者、教师不断进入德宏,有的经德宏、腾冲前往缅甸从事商业贸易。^{[7] (P48)}瑞丽、陇川、盈江成了进出缅甸从事对外贸易的交通孔道,而腾越已形成进出口贸易的枢纽和转运站。许多外来客商便落籍德宏地区,成为当地的居民。

二、继续迁移:以云南作为中转站继续向周边地区迁移

云南地处中南半岛北部,与东南亚、南亚国家相近相邻,是从陆地进入东南亚、南亚地区最佳通道。而永昌则处于云南、东南亚、南亚三地区的中心区域,往西经缅甸进入南亚、西亚等地区,往南进入东南亚半岛或岛屿国家,往东直达中国东南部,如此优越的地理位置,早在秦汉时期,就有汉人沿“蜀身毒道”前往南亚地区,沿途聚集定居。永昌不仅是通四方的交通枢纽,也是各种移民迁徙国外的中转站。

(一) 通畅的贸易通道便利内地移民继续迁移

秦汉时期,就有一条东起成都,经大理、永昌、腾冲、缅甸,西至印度、阿富汗的南方丝绸之路——蜀身毒道。内地汉族商人和边地居民络绎不绝地沿着三条商贸通道到达缅甸的萨尔温江和“母亲河——伊洛瓦底江畔”,或继续西行至印度、阿富汗等地,或顺江南下,进入印度洋,转折到东南亚、南亚甚至西亚和欧洲等国,他们有的在国外贸易经商,满载而归,有的则在国外定居下来,成为侨民。

处在“蜀身毒道”军事重镇和商品聚散地的腾冲历来都是军事移民、商业移民和民间自发移民聚集的地区,随着内地移民数量的增多,土地相对不足,促使他们继续迁移。《腾越州志》云:“昔日之货

殖者,富家以财,贫人以躯,输中华之产,运异域之邦,易其方物,利资养家。”尤其是腾冲著名的侨乡和顺在明代中期开始有人前往缅甸经商,并有少数开始在缅甸定居。现在和顺乡人在海外的亲属有一万多人,而和顺居民仅有六千多人。^{[8] [P2]}清政府对南明永历帝发动了围追性战争,迫使永历帝带领余部从昆明向永昌、缅甸避难,1659年初到达永昌时约有4000余人,“当永历帝一行(约四千人)于一月二十六日进入永昌。”三月下旬达到缅甸时只剩下1500人,“在边界的缅甸一方,永历帝一行还剩一千五百人,物资极度匮乏,护驾兵士大半已逃亡。”^{[9] [P158-159]}

清朝时期,进入缅甸经商的华侨更多。1885年,英国占领缅甸,继而把侵略目标瞄准了与缅甸相连的云南。1886年,清朝与英国签订了《中英缅甸条约》,其规定:“英国允由缅甸最大之大臣,每届十年派员循例举行;中国允英国在缅甸现时所秉一切政权,均听其便。”^{[10] [P485]}1894年,清朝与英国又签订了《中英滇缅边界及通商条约》规定:“英国极欲振兴与中、缅陆路商务,答允自条约批准之日起,以六年为期,中国所处之货及制造之物,由旱道运入缅甸。除盐之外,概不收税。”^{[10] [P578]}此条约放松侨商前往缅甸的限制。1911年,缅甸政府发布的人口统计,当时全缅华侨人口约为10.89万人;1921年增至14.91万人;1931年,全缅华侨人口已达19.36万人。^{[11] [P201]}

(二) 缅甸的丰富资源吸引内地移民继续迁移

缅甸位于亚洲东南部的中南半岛,东部与中国云南接壤,西面与印度毗邻,半岛南部伸入印度洋,在东南亚与南亚相接处,战略位置相当重要,同时,国内土地、矿产、森林资源丰富。南部为伊洛瓦底江三角河谷,雨热充足,土地肥沃,适应种植稻谷、棉花等农作物,北部为多为高原河谷地带,森林、矿产资源极为丰富,吸引不少的云南人前往缅甸开采银矿和玉石。

明初,明朝政府基于云南与缅甸货物贸易红火、人员往来频繁,故先后在缅甸境内和中缅边境地区设置十处土司政权,加以管理边界贸易事务,《西南夷风土记》记载:“自孟密以上,山多宝。蛮莫以下,地饶五谷。”“交易,或五日一市十日一市,惟孟密一日一小市,五日一大市。盖其地多宝藏,商

家辐辏,故物价常平。”“江头城(在缅甸八莫附近)外有大明街,闽、广、江、蜀居货游艺者数万,而三宣六慰被携者亦数万。”^{[12] [P3240]}

清初,缅甸地亘数千里,其酋居阿瓦城。城西濒大金沙江。江发源野人番地,纵贯其国中,南注於海。沿海富鱼盐,缅人载之,溯江上行十馀日,抵老官屯、新街、蛮暮鬻市,边内外诸夷人皆赖之。而江以东为孟密,有宝井,产宝石。又有波龙者,产银,江西、湖广及云南大理、永昌人出边商贩者甚众,且屯聚波龙以开银矿为生,常不下数万人。^{[13] [P14661-14662]}

清朝乾隆时期,在滇缅边境和缅甸北部地区相继出现了由华侨开采的茂隆银厂和波隆银厂,由于当地土民不识“烹炼”之法,茂隆和波隆两银厂的矿工皆为华人,各有4万余人,除矿工外,还有各种行业的商人和手工业者,两厂所在地皆“商贾云集,比屋列肆,俨一大镇”。^{[14] [P297]}

缅甸丰富的宝石资源以及处于中印之间的交通位置,不仅促进了缅甸社会经济发展,也使得腾冲商业贸易发展迅速。《腾越州志》卷三云:“今商客之贾于腾越者,上则珠宝,次则棉花;宝以璞来,棉以包载,骡驮马运,充路塞道。今省会解玉坊甚多,簪沙之声,昼夜不歇,皆自腾越至者;其绵包则下贵州。”^{[15] [P46-47]}当时,腾越人口达三十余万,州城八保讹为百宝街,清朝乾隆、嘉庆、道光年间有“昔日繁华百宝街,雄商大贾挟紫来”之辉煌。^{[16] [P371]}

三、变服易俗:汉族涵化为当地少数民族

中华民族在长期的经济文化交往过程中,不断出现民族融合,民族之间的涵化,有边疆少数民族学习汉族先进技术文化,逐渐“涵化”为汉族,而民族融合是双向的,也有汉族为了躲避政治迫害、逃避赋税负担等隐姓埋名“涵化”为少数民族。

云南西部边疆,历经元明清长期的战争,不但使本地区各民族迁徙频繁,同时,由于明代京(南京)川湖粤籍军人留此未回的很多,对本区民族构成以及经济文化方面也有相当大的影响,如梁河和盈江的户腊撒等地的汉族即多系这些军人的后裔,更重要的是明代在永昌府之下,设腾越州和干崖(今盈江)、南甸(今梁河)、陇川(今陇川)三宣抚司,盖达(今莲山)、遮放两付宣抚司,芒市、户撒、腊撒三长官司及猛卯、潞江两安抚司等,其中一部分土司,即系后世所称旱傣族的来源。^{[17] [P41]}傣族多被

人们分为“水傣”和“旱傣”(汉傣),水傣一般是保留了较为传统的百越文化特征的傣族,旱傣在历史上与汉族政治、商业、文化上交流较多,融入了较多的汉文化和汉族血统。有明一代,戍守永昌府腾越边关的汉族兵卒以及麓川之战、征缅战争的士兵大量逃入德宏傣族地区,正统七年(1442)右副都御史丁睿言:“金齿西南极边,洪武时屯守汉军不下二万余,焚人土军不下千余,今逃亡大半,仅余三千。”^[6]^(P614)与傣族女子进行婚配,受汉族影响的傣族吸收了一部分汉族和汉文化逐渐变成了旱傣。^[18]^(P23)

在云南西部地区,明朝初年派遣前来戍守边疆的汉族将士,后来为土著所融合,成为土著居民。明末,徐霞客在《滇游日记》中写道:“其地土人皆为麽些(纳西族),国初汉人之戍此者,今皆从其俗矣。盖国初亦为军民府,而今则不复知有军也。止分官、民二姓,官姓木,初俱姓麦,自汉至国初。太祖乃易为木。民姓和,无他姓者。”^[19]^(P5)后来迁入此地者生活习俗都逐渐融入当地,“流寓人籍者,必改姓和,故今里民和姓居多;自设流后。新复本姓。”^[20]^(P179)清代,在芒市、遮放的土司地区居民都说是“南京人”,而且还有历代家谱可查。至于平常他们对“夷人”说话时之所以自称“我们摆夷”,不过是藉此笼络人心,免得被人民看作是异族。^[21]^(P49)

四、结束语

明清时期,中原汉族出于政治、军事、经济目的纷纷移民西南边疆,尤其是幅员辽阔、人口稀少的云南为主要输入地。汉族移民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和思想文化,促进了边疆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充实了边疆军事防护力量,增强了国防力量,促进和维护了国家的统一。

明清时期这种大规模的内地移民浪潮,不仅掀起了云南土著居民的迁移活动,使土著居民从原来居住的坝子向山区或境外迁移,促使跨境民族的形成,而由内地迁移的汉族人士,或居住在坝区成为新居民,或迁移境外成为华侨,为当地社会经济文化事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尊重历史,了解历史,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到自力更生,又要对外开放,依靠自身能力,灵活应用华侨

力量,促进云南面向西南开放的“桥头堡”建设。

[参考文献]

- [1]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
- [2](明)刘文征.滇志[M].古永继校点.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
- [3]云南各族古代史略[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78.
- [4]永平县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
- [5]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6]明实录有关云南历史资料摘抄[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59.
- [7]苍铭.云南边地移民史[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4.
- [8]杨发恩.和顺——中国魅力名镇(华侨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5.
- [9](美)司徒琳.南明史[M].李荣庆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 [10]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11]涅德宁.近现代中国与东南亚经贸关系史研究[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
- [12]李根源.永昌府文征[M].杨文虎等校注.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1.
- [13]清史稿[M].北京:中华书局,1977.
- [14]王介南.缅甸[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7.
- [15](清)屠述廉.腾越州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 [16]李根源,刘楚湘主纂.民国腾冲县志稿[M].许秋芳点校.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
- [17]德宏傣族社会历史调查(三)[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18]苍铭.民族迁徙与云南边地民族涵化[J].现代人类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A].2002.
- [19]丁文江.徐霞客游记卷十四(下)[M].北平:商务印书馆,1928.
- [20]乾隆丽江府志略[M].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
- [21]曾昭抡.缅边日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王建平